

风雪征程

——东北抗日联军战士

李敏回忆录

(1924—1949)

下

李敏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在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面对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面对死亡的威胁义无反顾，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

——胡锦涛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ISBN 978-7-207-09581-7



9 787207 095817 >

定价：89.00元（上、下）

风雪征程

—— 东 北 抗 日 联 军 战 士

李敏回忆录

(1924—1949)

下

李 敏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下

(1939—1949)

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李敏回忆录

贈

王玉福

賀濤

同志存

壬午年十二月十日

李敏

Handwritten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s to include the following lines:

Handwritten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s to include the following lines:

第四章

艰苦复杂的斗争

第一次去苏联
回国途中
与冯仲云政委会师
陈绍宾、尚连生妖言惑众
刘凤阳、张祥被缴械
陈绍宾要缴赵尚志的械
分手于西征途中
陈绍宾、尚连生其人

王永昌书记带领我们搞粮食
第二次去苏联
冯政委带领我们西征
在三路军总指挥部
1940年的“五一”劳动节
教导队里的学习
一条艰险的路
第三次去苏联



第一次去苏联

上了苏联人的汽船后,我们总算是放心了。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呀,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好地休整一下了,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我们大失所望。

汽船一直往上游开,到了中午,才下了船。下船后,几个苏联士兵带着我们钻了好几个柳条通子来到了一片沙滩上。到了这里,那几位苏联人示意我们把步枪都枪口向上支到沙滩上,把背包也都放在一堆。这时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把目光都集中到白团长那儿,谁都不肯行动。白团长说:“既然到了这里,就守人家的规矩吧。”他带头把枪放到了沙滩上,战士们极不情愿地也把枪都架到了一起,大家说了:“这是啥社会主义啊?咋还缴咱们的枪啊?”

“咳,这是对咱们不信任啊。”

枪放好后,我们开始列队往西北前进。眼前是一望无边的大草原,草原上长着没膝深的羊草,风儿吹过,绿草翻涌,像是江上的波涛,这里的天显得格外的高,格外的蓝。

走出了草原,看见了一条沙石公路,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了。不一会儿工夫,一辆帆布吉普车从远处开了过来,咯吱一下,停在了我们跟前,车上下来几个苏联战士,开始发食品了。

我们每个人领到了一片黑列巴(面包),一条小咸鱼,那鱼还是生的。大家都饿坏了,三口两口的都进了肚。就这么点东西,没吃饱啊,怎么办?战士

朱学成和陆荣觉又伸出手去跟那几个苏联大兵要，只见他们摊开双手端着肩膀一连声地说着：“捏度，捏度。”（俄语：“没有，没有”的意思）

这是我到苏联学会的第一句话，战士们又七嘴八舌地说了：“啥社会主义国家啊，吃饭都不管饱。”

吃了一片列巴，肚子里多少有点垫底的了，苏联人让我们原地等待。太阳高高的、暖暖的照在我们身上，就在这异国他乡的大草原上，我们都睡着了。

天黑了，又开来两辆带帆布篷的大卡车，我们都上了车，车被挡得严严实实的，外面的景物一点都看不到。外面下雨啦，“噼啪噼啪”的雨点打在了车篷上。卡车颠簸得挺厉害，我开始晕车了，肚子里没有多少东西，就吐起了苦水。车上还算干净，我不好意思吐在车上，就脱下了自己的胶鞋，往鞋里吐，没想到鞋也破了好几个洞，吐进去的苦水又从洞里钻了出来。

这边的天好像亮的更早，也就三四点钟吧，天色发白，我们终于下了车。眼前是一栋一半地下一半地上的木头房子，房子挺大，能装一百多人。远处还有几幢小一点的木头房子。

这是一座兵营，里面搭着板铺，铺上铺着厚厚的干草。我们三个女的，住到了大铺的紧外边。

刚住下，就来两个苏联士兵把我们三个女的带走了。我们被带到不远处的一座木头房子里，我是第一个被带进屋子的，屋子里面十分的干净，地上铺着深红色的地板。我穿着漏了洞的破胶鞋，呱唧、呱唧地走过去，地板上留下一串湿湿的脚印。

一名苏联军官坐在一个桌子的后面，旁边还有一名挺帅气的混血翻译，翻译挺年轻，也就二十岁左右吧。审查开始了，他们问我多大了？参军前家在哪里？我刚准备回答问题，可一紧张我就急着想上厕所了。

我小声地咕哝着：“我，我想上厕所。”那个军官诧异地看着我，翻译把我的话翻给了他。他摆了摆手，让门口的士兵带我出去。

那个士兵把我带到房子的另一头，一伸手，示意让我进去，我推开门进去。



好白的屋子啊！到处都光溜溜的，里面还有好几个小门，我又推开了一扇门，里面还是白白的瓷器。

我要上厕所，咋把我领到这里来了？转身就想出来，一抬头，门口还有一面镜子，我抬头看着那面镜子，镜子里面的丑丫头是谁啊？脏乎乎的小脸，瘦得皮包骨头。咳，这是我吗？我咋变成这样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镜子。

厕所没上成，那个大兵又把我带了回来，进了门，那个军官又开始问话了。可我还是想上厕所啊，憋不住，都快尿裤子了。我带着哭腔说：“我要上厕所！”

翻译和那个军官都吃惊了，那个混血翻译问我：“不是带你去过了吗？”

“没有啊，没有，他就把我领到一个白屋子里。”

那个军官喊来了士兵，一顿嘀里嘟噜的话，我一句都不懂。这次，换成翻译带我上厕所了。

还是把我领到了那座白房子前，翻译告诉我：“进去吧。”我和他说：“我要去厕所。”他说：“这里就是。”我犹豫犹豫地进去，终于把问题解决了。

回来的路上我在想，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啊，连厕所都这么讲究。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也能变成这样啊？我暗暗地下着决心，等赶跑了小鬼子，一定要好好建设一个新社会，让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也能用上这样的厕所。

回到屋子里，那个翻译向年青的军官说明了情况，我看到那个军官笑了。

他们问了好些问题，多大了？什么时候参的军？父母都做什么？在部队什么职务，我的领导是谁？团长叫什么名字？师长叫什么名字？

我一一做了回答，回答完就让我出来了，接下来是柳明玉和朴大姐。等三个人都回答完了，就把我们都送了回来。

回到那个兵营以后，大家都好奇地问我们做什么去了，我们说明了情况，同志们都说：“哦，过堂去啦，下一个该谁啦？”

“啥过堂啊，人家那叫审查，到了人家地盘，还不得问问清楚啊。”

就这样，在这里被审查了七八天后，又最后核实一遍，我们坐上来时的帆布大卡车又被转送到了西边的另一个地方。

这里还是一片大草原，零星地长着几棵柞树和黄菠萝棵子。草原上放牧着大群的马匹，我们住进了一栋长长的木头房子，这所房子，很可能就是冬天里的马厩。

房子里铺的是地板，地板上铺着干草。干草厚厚的、暄暄的，人躺上去十分舒服。我到部队已经三年多了，冰天雪地，风餐露宿早已经习惯了，到了这里忽然睡不醒了，战友们和我一样，也是整天地呼呼睡大觉，睡了七八天才过了劲儿。

在这里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我们称为“面包事件”。

我们每天的伙食，主食就是黑列巴，菜是一位苏联老大妈用土豆、白菜熬的苏泊汤，装在“喂大罗”（俄语：铁桶）里。

熬菜的老太太五十多岁，头发全白了，满脸慈祥的皱纹。每天吃的面包由苏联人开车送到老太太那里，我们每个连再派人去领。

每个连可以领到两个长方形的大列巴，回来后再切成片分给大家，同志们都吃不饱，总是在发牢骚：“这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咋地啊，咋还不给吃饱饭啊？”

有一天，一连领回来两个面包，二连就领回来一个。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个面包都吃不饱，一个咋分啊？没办法，大家只好把那一个面包切成了小薄片，分了下去。吃完面包，我们去给老太太送装汤的小铁桶。去往老太太那里时，要路过一片小柞树林。就在大家过小柞树林子时，看见了战士陆荣觉正在那里吧嗒嘴呢，嘴角和手里还有没吃完的面包渣。

大家一下子全明白了，原来是这小子多吃多占啊。陆荣觉看见大家，嘴里嚼着列巴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实在饿的不行了……”

战士们七嘴八舌地数落他：“你饿，别人不饿啊？你咋那么好意思啊？”

陆荣觉也不分辨，就会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风雪征程

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李敏回忆录

白连长也来了气,这还了得,自己就敢偷着吃了,怎么办?罚他举棍吧。

陆荣觉站在了门外,两手向前伸直,举着一根木棍,他也不生气,也不说话,就这么一直举着,大家看着又可气,又好笑。

这时,门口的苏联哨兵看见了,忙问咋回事,老付头比比划划地告诉他,这个人偷吃了一个面包。

那个哨兵听明白了,赶紧去打电话,他们用的是手摇电话机,也不知道那个哨兵都说些啥,就听到一句:“啊罗,啊罗。”两个多小时后开来一辆吉普车把陆荣觉拉走了。

领导和战士们这下都毛了,杜指导员埋怨白连长不该罚他举棍,白连长说:“不罚他,以后再出现这种事情怎么办?”

战士们埋怨老付头不该说了实话,老付头说:“我也没想到会给带走啊!”

埋怨归埋怨,大家都估计,这老毛子会咋处理这事呢?老付头又说了:“咋处理,人家的法律可严了,听说偷个麦穗都要蹲笆篱子(监狱),那一个面包还能少判了?”

听了老付头的话,大家又都替陆荣觉担心了,一个麦穗都要判刑,那一个面包得用多少个麦穗啊?得判多少刑啊?

第二天,吉普车又把陆荣觉送回来了。大家赶忙围上前去:“老兄啊,你可回来了,咋样了?咋样了?他们对你咋处理了?蹲没蹲笆篱子啊?”

“咳,别提了,别提了,都白吃了,都让他们给掏出去啦!”

“啊!?”

原来是那帮苏联人,一听说他一个人吃了那么多的面包,怕他撑坏了,拉到了医院,又是洗胃又是灌肠,好顿折腾,都给折腾出去了。

大家这个笑啊,笑得肚子都疼。不过,打那以后,苏联人给的面包一天比一天多了些,勉强能吃饱了。其实,苏联方面也是为我们的健康负责,因为我们在国内经常饿肚子,如果一次性地吃得太多,太饱,容易发生危险。

第二个事件是电影事件。有一天,来了一个大卡车,几个苏联士兵从车

上卸下来一大块白布和一台机器，他们把白布挂在了外面的墙上，把机器支了起来。我们看着他们，都不知道是咋回事，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不一会儿工夫，白布上出现了人影，大家都惊讶地看着，忽然白布上的火车“轰隆隆”地向我们开了过来，这下可把大家吓坏了，有的人竟然跑出了好远。有的战士说了：“怕啥，这就相当于咱们的驴皮影。”几个苏联士兵看到我们这样，也都笑了。

有的战士把跑出去的战士又喊了回来：“别怕，别怕，是放驴皮影呢。”

“啥驴皮影，这叫电影，你们也太‘老赶’（外行的意思）了。”

这时，大家都说了：“还是这社会主义好啊，有电灯有电话，还能看电影。”

“等咱们回去，赶跑了小鬼子，也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

这就是我在苏联看的第一部电影，影片的名字叫《夏伯阳》。

转眼，在苏联呆了快有两个月了。农历七月中旬的一天，开来一辆大卡车。卡车给我们送来了好多东西，每个人发了一套藏青色的帆布列宁服，一个带遮的列宁帽，一把新枪。子弹随便拿，还有像小米一样的糜子米（糜子），也是随便拿。

没有子弹袋，但是他们拉来了布匹，做饭的老太太有台缝纫机，我们三个女兵，白天黑夜地给每个人做了一个子弹袋和一个背包。

当一切都准备好后，一天，开来了两辆帆布篷的大卡车，我们带着东西，全部上了车，卡车风驰电掣般地向黑龙江边驶去。

当时，东北抗联寻找和联系党中央关系的过程如下：

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撤销之后，成立了吉东、北满、南满和中共哈尔滨特委三个省委，分别领导抗联各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东北城乡地下工作。1932年以前，中共中央对中共满洲省委和抗联的领导，是在上海实施的。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入苏区之后，中共满洲省委同上海中央局联系。1934年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东北党组织的工作便由中共中央驻莫斯科



风雪征程

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李敏回忆录

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负责领导。在满洲省委撤销之初,中共代表团曾在远东海参崴城设立办事处,并派吴平等同志由这里进入东北,对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实施领导。1935年9月间,吴平离开吉东返回莫斯科。从1936年2月起,中共代表团又从抗联中调走大批干部去莫斯科学习。1937年全国抗战全面爆发后,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王明等人于同年离开莫斯科回到中国延安。从此,“中央代表对满洲党组织最低限度的工作领导联系遂因此而最后断绝”。^①

随着同中央失去联系以及斗争环境的恶化,各省委之间,抗联各部队之间相互支援和配合逐渐减少,以至完全中断,抗联各部队基本上是在敌人分割、包围下孤军奋战。而东北党组织内部也因此发生许多矛盾隔阂长期得不到解决。

多年来,抗联各部为寻找中共中央关系尽了一切努力。1935年12月,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派遣中共珠河团县委书记小孟(即韩光,解放后曾任中共旅大地委书记、旅大区党委第一副书记、旅大市市长、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等职)去吉东了解中共代表团来信情况。几乎在这同时,吴平从莫斯科来信调小孟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是,小孟在密山一带进入苏境,并得到远东军的帮助前往莫斯科参加会议。但由于他一去不返,杳无音信,赵尚志于1936年底又派北满省委执委朱新阳为临时省委代表,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汇报。朱新阳从佛山县境(今嘉荫)过境入苏,先被苏边防军送往伯力、海参崴关押审查,1937年5月才从海参崴监狱出来到达莫斯科,但他也是一去不回音。到1938年1月,赵尚志率所部在萝北一带作战失利,他为寻找中央关系和求得苏联支持,进入苏境。当时苏联远东军把赵尚志以及随后不久因战斗失利进入苏境的戴鸿宾等约五百人队伍解除武装,人员大部遭遣散去新疆,而将赵尚志、戴鸿宾以及

^① 1938年11月2日《周保中关于满洲党的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信》,见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3册,内部印行,第105页。

1937年末入苏求援的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扣押一年半时间。

与此同时，中共吉东省委抗联第二路军领导人也在积极寻找中央关系。1938年1月，周保中代表吉东省委赴饶河解决第七军问题之后，于20日越境到达远东吉兴（即今比金镇），设法寻找中共中央代表团在那里的联络站。但这时联络站已撤销，他只得到中共中央联络站在当地的嘱托人石达干诺夫的简单传达（石达干诺夫，是苏籍华人，籍贯山东）。临返回东北前，周保中留一封信给中共中央代表团，请石达干诺夫转交，此行没有达到目的。

1939年4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执委会议，改北满临时省委为北满省委。会议决定派省委常委、宣传委员冯仲云，常委、组织委员张寿箴分别到下江、龙北地区领导在该地区活动的北满抗联部队。7月中旬，赴下江地区工作的第三路军政委、省委常委冯仲云受北满省委书记金策的委托，以及他根据下江抗联部队面临的严重情况，派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过境与远东军联系，力图同中共中央接上关系，并谋求远东军的支援。两个月后，高禹民返回东北，并于9月中旬同冯仲云一起再度从萝北县兴东越界到达远东伯力城，与苏联远东军有关方面进行了磋商。

在此之前，远东军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1939年冬，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形式急转直下，抗联部队“常常陷于弹尽粮绝，饥疲困乏，断指裂肤的苦境”，队伍大量减员而得不到补充，“问题到了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抗联各部领导人不能不考虑如何保存实力、制定新的游击运动计划的问题。在苏联方面，日军于1938年和1939年在中苏、苏蒙边界地带连续制造挑衅事件，即张鼓峰事件与诺门坎事件。同时，德国法西斯于1938年夏进攻波兰，西方战线形势吃紧。苏联方面为避免两面作战，需要同战斗在中国抗日前线的东北抗联协同合作，以确实稳定东方战线。在诺门坎战斗进行期间，苏联远东军把关押一年半的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等抗联领导人放出并派回东北，其目的显然是希望他们在东北加强抗日游击活动，以牵制日军。远东军为做好战争准备，确保本国的安全，急迫希望得到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情报，他们知道只



风雪征程

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李敏回忆录

有依靠东北抗联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在乌苏里江西岸活动的崔石泉、王效明等率领的抗联队伍,已和远东军建立了联系,并开始得到远东军少量的武器援助。就是说,由于形势的发展,远东军对抗联和东北党组织由原来较为冷淡的态度转而为热情和希望合作,远东军方面对冯仲云的提议表示,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决定以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东北抗日联军。远东军方面还表示,他们首先要帮助解决东北党组织内的问题。

回国途中

在苏联经过两个月的休整后,我们准备重返祖国了。

从苏联回国时,我们第六军第一师由代理师长陈绍宾和第三团团长白福厚率领,大家乘帆布篷大卡车来到黑龙江右岸。这时,夜幕已经笼罩了整个黑龙江面,我们摸黑上船,被安排在船的底舱。

我们刚刚坐下,就听有人扯着大嗓门宣布:“我们是赵尚志部队的,我叫刘凤阳,我身边这个大个子是张祥,还有尚连生、姜乃民、赵有才。”

听说是赵尚志部队的同志,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道:“赵总司令回来了吗?”

话音刚落,就听到一声粗壮的声音回答:“嘿嘿,赵总司令早就回来了,他正率领部队在国内打日本鬼子呢!”答话的人就是张祥同志。他一边用小纸条卷着马合拉烟(旱烟)一边回答着,他还像寻找什么人似的从东到西扫视了一番。

听了他的回答,好几个人急不可耐地发问:“这是真的吗?赵总司令是什么时候回国的?”有人还兴高采烈地呼喊:“噢,太好了!赵总司令又回国打小鬼子啦!”接着又有人诙谐地说:“咳,这下子日本鬼子该遭殃了,又得叫喊‘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喽!’”

看到大家如此高兴,张祥更为神气地说:“赵总司令一回国,头一仗就狠揍了乌拉嘎警察所,干掉三四个日本军事测量队,缴获了不少武器和一些测量仪器。那些仪器么,咱们还用不上啊,这不,派我们送到那边(苏联)去了。那些个玩



意儿‘贼沉’（很沉的意思），老毛子还挺高兴呢。”

听了他的话，大家都乐得合不拢嘴，张祥又乐呵呵地说：“真没想到咱们坐上一条船回来了，有缘啊。”

大家都被张祥的话语吸引住了，一下子把他围在中间。有人问：“赵总司令是为了咱们抗联的事儿去苏联谈判的吧？结果咋样啦？”又有人问：“这次发给我们的枪支是谈判得来的吗？”此时，张祥只是默默地看着大家。他没有马上回答，收起笑容只顾一根接一根地卷着马合拉烟吸个没完。

他不回答，在座的可等不及了。有人既像发问又像自语地说：“赵司令为啥才回来呀？听说苏联把赵总司令关起来了，说苏联不承认请过咱们，不承认书面邀请过赵总司令。”又有人发问：“还听说苏联把赵总司令和戴军长都关进笆篱子啦，这是真的吗？”有人立即反驳说：“那不可能，那么大的司令，谁敢那样慢待呀。”这时，有人揭底说：“确实是苏联捎信让咱们派一位高级领导去苏联谈判援助咱们的事儿，所以啊，1937年冬天在依兰杨木岗开会研究了派谁去谈判的问题，最后决定派赵尚志总司令去苏联，由戴军长护送他到萝北县江边的。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可是他们把赵司令一关就关了一年半，误了多大的事儿啊，真是想不通啊。”

听到这话，刘凤阳团长也忽地站了起来说：“千真万确，不发信，咱们能去吗？”

白福厚团长也过来证实说：“大家都知道信是陈绍宾师长捎来的，这还能是假的吗？！”大家正七嘴八舌地纷纷议论时，白福厚团长见陈绍宾过来了就大声喊道：“好啦，都别吵了，都听陈师长的吧，是陈师长亲自捎的信。陈师长对这事最清楚，他完全可以作证。”

话音刚落，大家顿时静了下来，都把目光集中到陈绍宾的脸上，等待他的回答。陈绍宾注视了大家片刻后，把手一挥说：“这种事与咱们无关，是上头的事，是共产国际的事，你们管这种事干啥？都快去睡觉，夜里还要行动，该抓紧休息啦。”师长这么一说，大家也只好服从命令各自去休息了。

这中间只有一个叫尚连生的没有说话，他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看上